日治時期臺灣共計成立23所公私立高等女學校（以下簡稱高女），其中，在高雄州下便有高雄高女及屏東高女。然而，同樣作為戰前大高雄地區培育女子菁英的學校，相較於高雄高女的校史、校地已有多篇相關研究問世，屏東高女的校史似乎相對受到人們的注意較少，還有極大的空間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究。諸如，在地理位置上，屏東高女雖然不是當時日本帝國最南端的高女（位於地理位置最南端的高女是高雄高女），但它亦非如蘭陽高女這般，雖與臺北州其它高女同屬一州，卻因山脈阻隔、地理空間獨立而必須獨立設校，也不像花蓮港高女、臺東高女或澎湖高女為該行政區唯一一所高女。屏東平原與高雄市區之間並無山脈屏障，嚴格說起來，屏東高女與高雄高女的距離相隔也不算遙遠，為什麼要在高雄高女之外，於1932年在屏東另設屏東高女？該校的創校始末如何？而屏東高女的學生又是哪些人？她們來自哪裡？這所高女和屏東在地社會有什麼聯結？臺、日人學生之間是否存在差異？這些疑問都一一待解。所幸上述問題能在今日得到解答。屏東高女自1932年創校以來，每年辦理招生及入學，是高屏地區最重要的女子學校之一。該校在戰後改制為國立屏東女中後，校方仍保存日治時期各屆學生的學籍簿，學籍簿集結了謄錄每一屆學生個人基本資料的學籍資料卡（以下簡稱學籍卡），該生在校期間成績、身高體重、學生性格、個人表現等，也都詳列在學籍卡上，因此學籍簿可說是是研究在校學生身分背景最重要的史料。作為校史研究的一部分，本研究擬從學籍簿著手，解析屏東高女學生的特色，作為未來延伸研究之基礎。至於教職員、教學情形與校園生活等面向，則留待未來另行探究。有關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研究成果，概可從「女子教育政策及推行情形」、「各校校史之爬梳與研究」，以及「對臺灣與地方社會的影響」等三方面分述。女子教育政策及推行情形方面，游鑑明《日據時代臺灣的女子教育》堪稱是最重要的經典之作。

其研究從三個面向切入，第一是女子教育政策，爬梳女子教育政策從建立、變遷到大致定調的歷程，並說明政策落實後的實務；第二是社會對女子教育的反應，早期眾人多懷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對女子教育不甚重視，後來才漸漸轉為支持，態度轉趨積極；第三是以女學生為主體，探究其校園生活、畢業後的動向與社會參與。游鑑明指出，日治時期透過女子教育體系，塑造了一批與往時不同的新女性，但是整體而言，接受近代教育的女性人數仍少，且臺、日人之間仍存在差異，女子教育仍有其侷限。 游鑑明之研究為讀者勾勒出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基礎面貌，全面性地討論從教育政策到教育實務，再到社會變遷的脈絡，是本文極為重要的核心參考資料。而游氏長期對近代中國及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職業婦女及重要人物等女性史議題投注心力，可視為其對女子教育的延伸關懷，無論是口述歷史或學術研究，成果均稱豐碩。此外，山本禮子對日治時期臺灣高女所做的研究也具有高度參考價值。她在《植民地台の高等女　校研究》中，先闡述了日治時期臺灣女子中等教育的變遷，再分析臺灣人就讀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及專收在臺日人的高女的辦學情形、學生就學狀況，以及畢業生的動向。她接著再進一步聚焦，分別以臺北第三高女、臺北第一高女和臺北第四高女為例，具體爬梳作為兩個不同民族女子教育的頂尖學校是如何運作的，以及作為殖民最末期成立的高女，相較於其他學校的特殊性。最可貴的是，山本禮子試圖透過解讀她對畢業生所進行的口述訪談，來呈現高女的校園生活，並留意學校教育對臺灣社會的影響。作為全書的末章，她以靜修高女為例，說明越接近戰爭動員的殖民末期，基督教學校對於殖民當局所面對的衝突與妥協。 相較於游鑑明的研究，山本禮子的研究更加關注民族之間的差別，深入地觸及日籍學生的校園生活及其回憶。不過，作為臺灣高女的全面性研究，山本禮子並未特別關注同樣以臺籍或日籍學生為多的高女，彼此之間細微的差別，也未特別關照屏東高女的情形，有關高女之研究仍有發揮的空間。卓姿均同樣從女子教育政策出發，討論一九二〇年代前後高女之設置，她認為歷經兩次〈臺灣教育令〉修正、日臺共學等政策轉變，高女的設置在1924年達到高峰後進入停滯狀態，直到1937年才又再度迎來下一次高峰，並以臺北第三高女、新竹高女與蘭陽高女等三所學校為例，說明政策與地方社會對高女設置的影響。 或國小等地方上的學校作為研究對象，這類整理各校校史而撰成的碩士論文數量龐大，有些改寫、出版為專書，有些學校則由該校對校史懷抱熱忱，或具歷史學專業訓練的教師編寫成校史，如高雄高女、北一女中均出版有相關研究。

至於有關各校校史之爬梳與研究。整體而言，此類研究大約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種是2000年以後臺灣文史系所大量出現，或是在重視鄉土、強調本土教育的思維下，學院內的歷史學系研究生以高中、女中、另一種則是由於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鄉土意識崛起，終於使得戰後長期堅實不移的「反日」思維在一九九〇年代以後出現鬆動， 全臺各地，從小學到大學，都有日籍校友帶著思念的愁緒回到曾經在此就讀過的母校。解嚴後日漸重視臺灣史的時代潮流，以及日籍校友的來訪，皆促成這些歷史悠久的老校開始回顧自己的歷史，他們除了將校史的起點由1945年向前推移至日治時期的創校年代之外，也逐一盤點那些過往校園曾有過的人事物並加以記錄。這些成果，在學校創校達80、90等重要整數周年校慶時被集結為一本本的紀念專刊，若是100周年校慶，則更是值得大書特書，出版以茲紀念與慶祝。因此， 無論是公立或私立學校，以十年為單位的周年校慶出版品琳瑯滿目，不勝枚舉。例如，前身是臺北州立第一及第三高女的臺北市北一女中、中山女高，校史悠久且不乏頭角崢嶸的校友，不少人日後成為政商名流的夫人，或是本身就是各領域的成功人士，因此無論是校史或特定人物的相關研究，均在所有高女中堪稱最亮眼豐富， 除了屏東高女之外，其他像是彰化高女、 嘉義高女、 臺南高女、 蘭陽女中 ，以及私立的淡水高女 ，也都有相關的研究。研究者整理出各校的發展梗概後，陸續將研究焦點轉向高女所實施的課程、學校建築、制服等議題，像是蔡雅薇分析高女學生制服的特色， 蘇信宇與蘇嘉惠則同樣注意到學校建築，前者關心全臺灣的中學校與高女的建築物， 後者則將焦點落在臺北州轄下的高女建築上。 課程方面，許峰瑞討論1922年至1945年之間臺灣高女的圖書教育， 瀧澤佳奈枝以臺北第三高女為例，關注臺灣的女子技藝教育， 陳建森著重臺東高女對臺東地區軟式網球的推動， 林玫君、 金湘斌 等人則長期關心女子體育的情形。這些研究雖然都非以屏東高女作取材對象，但皆能使我們更加深入地認識高女校園生活。最後，有關女子教育對高女畢業生本人及家庭、地方社會所帶來的影響，前述有關訪談高女畢業生的口述歷史裡，在校接受的教育如何成為個人往後人生經歷的養分，往往是訪談的重點之一，而畢業生們多半也會述及在校期間教師在學問之外，對女學生教養的要求養成自己良好的生活習慣，特別是在學校的校史出版品，這樣的說法處處可見，不勝枚舉。

而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則從宏觀的角度對女子教育的影響提出解答。洪郁如先談到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的趨勢演變，她援引駒込武的觀點，認為日治時期統治者基於警戒臺灣人與中國革命之間的連結而採取「協力運作主義」，將臺人士紳納入體制內，教育即為其中一環；女子教育最初以技藝教育與國語教育為主，但隨著臺灣士紳對教育的期待不斷提高，官方也必須重視女子教育的需求，增加女子中等教育的空間，但在課程上逐漸降低技藝導向的課程，轉而提高普通教育的教學內容。1919年〈臺灣教育令〉實施以後，普通課程與技藝課程的比例逆轉，養成臺灣女子的「國民性格」成為教育重點，1922年修正〈臺灣教育令〉之後，這個教育重點更加強固。要言之，洪郁如認為，透過高女等學校選拔制度，接受近代教育的「新女性」階層於焉誕生，她們通常出身經濟條件較佳的家庭，屬於在地上級階層，再加上學歷取代了纏足成為女性的文化資本，她們在臺灣共構出一個上層階級、近代文明與帶有日本色彩所交織而成的「高女文化」。 這是對高女中的臺灣人學生所做出的宏觀觀察，那麼，在臺日人呢？她們是否也有同樣的現象？再者，這樣的觀點是否能夠運用在日治中期以後開校的屏東高女之上？本研究即在這些研究之上，以屏東高女的學籍簿為研究對象提出實證的觀察。

最後，本文欲將焦點往南移動，特別注意同樣位於高雄州境內的高女。許聖迪《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以高雄高女為研究對象，曾任高雄高女教師、自言「礙於生理因素一輩子無法成為雄女人，但自許有一天可以成為被崇拜的傲嬌紫槓雄女魂」的許聖迪，憑恃著其對該校的熱情，娓娓道來高雄高女的入學考試、師生、校園活動乃至於戰時下的校園生活，讓我們一窺日治時期二十餘年之間，這所高女如何屹立在帝國最南端。除此之外，許聖迪也先後撰有多篇以高雄高女為主題的學術論文， 《帝國最南—高雄高等女學校》一書，可說是他多篇研究之及大成。

寫高雄

Kaohsiung History

2026 屬於你我的 高雄歷史

相對於高雄高女，當我們想要進一步探究屏東高女的歷史時，卻意外發現，不僅學界似乎未有以此為主題的研究，屏東女中也未曾出版任何校慶專刊或任何述及校史之正式出版品，更令人詫異的是，有別於戰前創校的各所高中網站至少揭露創校年代或歷任校長，屏東高女的網頁資訊上，即使是對該校日治時期的校史也未有隻字述及，創校年代、日治時期歷任校長等基礎資訊均付之闕如。 本研究作為屏東高女研究的起點，並將以本研究為基礎，未來陸續進行屏東高女的其他延伸研究，期使日治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的面貌更為豐富。日治時期統治者對在臺日人、漢人及原住民族的統治態度與教育目標不同，原住民族教育自始自終都自成獨立系統，無論在教學目標、修業年限、教材與教師選任等制度上，均與在臺日人及漢人不同，無法同一而論，因此本文所敘述的女子中等教育暫且略過原住民族的部分。至於在臺日人與臺人的女子教育，在1922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發布前分屬不同系統。臺人女子教育部分，殖民政府來到臺灣後，很快地就意識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當局在1897年於士林成立「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招收臺籍女學童，進行日語與手藝教育，這裡即是日治以後殖民體制內女子教育的起點。1902年，它改制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1910年再改為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 這所學校雖然是一所初等教育機構，但由於日治初期女子受教育的觀念仍未扎根，女子教育需求不高，學生缺席率或退學的情形明顯。後來，因教育現場對女教師的需求，女子分教場的學生畢業後隨即被延聘為教師，女子教育的需求亦隨之大增。然而臺灣卻無相應的教育，直到1919年為止，專供臺灣人女性就讀的學校僅此一所。1919年，當局發布〈臺灣教育令〉，設置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將臺人就讀的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改制為臺灣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並新設臺灣公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籍女性終於有了另一所學校可升學了。設有修業三年的實科之外，還設有修業一年的師範科以培養臺籍女性師資。 1921年，當局修正〈臺灣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官制〉（勅令135號），將高等普通學校全數交由各州移管，此時公立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改為州立並新設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另一方面，日治以來，在臺日人女性同樣缺乏小學校畢業後的升學空間，有意升學者只能返回日本本國，因此當局從1904年在臺北第二小學校設置女子補習科開始，進而頒行〈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學校規程〉（府令67號），明定該校「以內地人女子施以高等普通教育為目的」，逐步發展在臺日人的女子教育，直到1908年臺灣總督府發布〈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勅令47號），成立招收日籍女性的高女，但修業年限較日本本國高女短。 1917年又另外在臺南成立臺南高女，從此臺北、臺南各有一所提供給在臺日人女性就學的官立教育機構。 1922年，第二次〈臺灣教育令〉發布，本於臺日共學的精神，再度調整中等教育制度，並將各地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變更為高女，另設修業一年的講習科，延續其師培功能。在臺日人部分，1921年廢除〈臺灣總督府高等女學校官制〉，改行〈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官制〉（府令129號），並發布〈臺灣公立高等女學校規則〉（府令88號）改制或新設高女，並設有補習科。綜合過去分別招收臺、日人的女子教育機構，1922年改制的當下，臺北有第一、第二、第三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北州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中高女、彰化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中州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臺南第一、第二高女（原臺人就讀的臺南州立臺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過去臺、日人各自依循不同女子教育體系，從此合而為一，高女制度可說是大致底定，接下來各州是各地的需求由州廳成立高女，直至1945年日治時期結束為止，臺灣各地總共成立20所公立高女，及淡水、靜修、長榮等3所私立高女。此外，1919年以前，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規劃設置師範科、師範速成科及技藝科，但前二者實際上並未實施，因此由技藝科畢業生加以補充相當的教育後權充公學校女教員。 1919年，該校改制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後新設師範科，繼續肩負育成公學校女教師的任務。 1922年臺、日籍學生的女子教育體系整合後，由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改制而來的臺北第三高女及彰化高女則附設講習科，以培養公學校女教員； 臺北第一高女及臺南第一高女則在1923年設有修業年限一年的補習科，培育小學校女教員， 其後進一步明定兩校在校期間若曾在選擇科目（選修）中修習教育課程的畢業生，通過成績考查後，可依無試驗檢定取得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或公學校本科正教員之資格。 1932年屏東高女創設時亦循此制度，由補習科培育小公學校女教員。臺灣女子中等學校的設置，一開始校數極少，1919年以前，臺籍學生就讀的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即後來的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附屬女學校）本科均屬公學校的基礎教育，1919年以後，該校改制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並另設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才算是補充了初等教育以上的女子教育。日籍女性所就讀的高女則至1908年始於臺北設校，臺南高女的設校則要等到1917年。由此可知，高女的設校直到一九一〇年代末期為止皆以北部為主，在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成立以前，臺籍女性在完成公學校教育後，若要繼續接受中等教育，只能選擇報考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手藝科，因此報載「吾臺女子教育。除公學校外。視為高等者。僅艋　之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以外概無所聞。」 確實如此。因此，屏東地區的公學校女子畢業生，若有心向上求學，此時除了背起行囊遠赴臺北等外地讀書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即使是1917年以後自小學校畢業的日籍學生，若要就近升學，也只有臺南高女可報考。地方人士認為全島公學校女畢業生爭搶國語學校附屬女學校區區150個入學名額，必然有超過半數的考生落榜，因此1917年臺南、阿　（屏東）、嘉義等廳參事、區長及有力人士前往總督府請願，冀請懇設臺南高女，「此舉大有益於地方女學。不但臺南三廳受其惠。即其附近各廳亦將振興女學也。」 最後臺南高女如願開設，當年也為這三廳的考生於臺南公館開設考場， 表示屏東地區仍有希望接受女子中等教育者，但除了遠赴臺南報考臺南高女之外，別無他法。1920年前後是臺灣史的一大轉捩點，不僅臺灣地方制度上在此時改為實施州廳制，1920年前後也歷經，兩次〈臺灣教育令〉的發布與改變，高女的設置也迎來高峰期。 在高雄州，1920年地方制度變革後，南部地方歡天喜地迎接高雄州時代的到來，不過警察出身的首任知事富島元治走馬上任後，在面對記者的訪問，表示執政的首要工作是「物價的調節」，其次是「道路品質的改善」，接下來分別是「高雄醫院院長人事案」、「高雄住宅困難問題的解決」，以及「南支南洋發展的具體對策」， 此時富島腦中的那張高雄州發展藍圖主要以民生為主，尚無教育規劃。不過，在高女之前，州民先是對於設置州立中學校一事表現得非常熱心，只是面對各方的提問，富島知事接著在1921年做出這樣的表示：

高雄街有設置一所中等學校的必要，因此現下正在著手進行各方面的調查，但是此刻尚屬地方財政窘迫的時候，在此時要實行，不免困難。 1920年以後，設置中學校及高女交由各州主導，開辦經費成為州廳預算的負擔，因此富島知事初以財政窘迫為由暫緩設置中等學校。只不過地方人士卻從就學需求加以考量，他們認為摒除就讀醫專及農林專門學校的人數，從高雄州前往臺北、臺南等地就讀中等以上學校的子弟超過450人，顯示高雄地區學子向學心旺盛，實有盡速設置中等學校之必要， 甚至有政論刊物認為「擁有三萬人口的高雄，卻連一個中等學校都沒有，真是恥辱」，地方人士因此推動設置中等學校的請願運動。 經過州廳的調查，高雄州向總督府提出設置中學校及高等普通學校的申請， 本案在總督府的預算會議中獲得支持而露出曙光。好消息傳來，州民感到振奮。經費的難題解決後，接著是校地與校舍的問題。州立中學校究竟要設在哪裡才好呢？教育課長大橋毅表示，既然是州立中學校，理應設置於高雄，但校舍用地頗大，市街中無適合之處，恐需設於郊外，「然由經濟上觀之。設於屏東。諸般較為便利。」但「目下將設在屏東或高雄。尚未確定。」 屏東也是中學校校地之選。然而最後因1921年發生在屏東街上的一場深夜大火， 讓屏東人的熱切期待落空，1922年，高雄州下第一所中學校在高雄街設校。有了高雄中學校之後，高雄州民的下一步即是呼籲高女的設置。 1923年，高雄第二小學校落成開校，高雄第一小學校的學生部分轉移至第二小學校就讀而多出6間空教室，州當局釋出可能另設高女的消息， 儘管預定於1924年開始招生的基隆、新竹、高雄女學校及嘉義中學校的預算一度在日本大藏省的審議中遭逢卡關危機， 不過最後各校仍在1924年正式成立，高雄高女成為高雄州下第一個高女，同年創校的還有位於屏東街的屏東農業補習學校。屏東街民先是錯失設置高雄中學校的先機，兩年後又眼看著高雄街喜迎高雄高女，地方民眾雖然扼腕，但對於設置學校的熱意仍未消退。1927年，新竹、嘉義兩街街民發起運動，醞釀升格為市，以此為契機，屏東商工會在4月25日召開臨時總會，商工會提出三個訴求：其一為有鑑於屏東學子的就學需求，希望能在屏東成立一中學校，使屏東、潮州、東港、恆春各郡，甚至旗山郡的子弟都能就近就讀。其二為設置女學校的呼籲，有志者主張「又如高等女學。本年志願者亦有百七十餘名。若得設立屏東。雖須扣除高學二學級百名

不過，這三個主張之中，作為農業教育的重鎮，屏東農業補習學校被視為是「中學校、女學校設置之前提」，最後如願在1928年4月升格為屏東農業學校， 屏東街民大開祝賀會，沉浸在農業學校升格的一片歡聲之中，但屏東高女及中學校的設校此時依舊未盡人意。辦校之際，經費及校舍校地往往是最大的難題，難產多年的屏東高女，在屏東農業學校可能釋出校舍而再次出現曙光。該校因規模擴大，校舍不敷使用，另在屏東歸來著手興建新校舍。1930年，農校新校舍雖尚未落成，屏東街民早已開始運動屏東高女的設校，認為屏東的父兄長輩不放心女兒們搭乘火車前往高雄就學，且屏東、潮州、東港等地有志升學的女學生就有140名，若設置屏東高女，志願者推估更可達250至300名，眼下屏東農校即將遷至新校舍，舊校舍正好可以充作屏東高女之用，因此「希望能在下淡水溪以南設置女學校」，東港、潮州、萬丹、里港各地有力人士也發聲響應， 設校呼聲再起，州當局同意進行相關調查。 1931年3月，屏東農校正式遷至新校舍。 屏東街上的舊校舍閒置後，6月，屏東街代表先後向屏東郡守武田駒吉及當時的高雄州知事平山泰提出設置女學校的請願， 並由屏東、潮州、東港三郡代表提出請願書， 請願團人數高達九十餘名， 基本上這三郡的人口已經佔了屏東總人口的絕大多數。7月，由屏東街長渡邊發藏及屏東商工會代表等人組成的請願團至臺北向總督府，就新設女學校、設置法院支部及架設下淡水溪橋等案向內務局長及總務長官陳情， 並特別說明此三案中，尤其是女學校案，若未實現，對街民的子女教育有莫大的不便。 沒想到，此去陳情未久，當局又閃電宣布到任僅半年餘的高雄州知事平山泰轉調臺北州知事，1931年9月起知事為野口敏治，平山泰離開高雄前，再度提及他在意卻未完的政務，其中即包含屏東高女設校，以及高雄中學校增班事宜。 此時正好也是總督府正在審議隔年預算的時刻，地方代表更為積極請願，平山知事雖然即將轉調，仍允諾協助向總督府交涉，希望納入預算討論。 然而當時遭遇政府財政緊縮，除非極為特殊或重要的新政策案，絕大多數的預算提案均被刪減， 高雄州也不得不依照各項提案的輕重緩急緊縮或節約預算。 總督府預算在年底送至拓務省審查，對於可能因預算排擠而再度夭折的屏東高女設置案，在平山知事、新任的野口知事相繼努力後竟敗部復活， 可能獲得總督府的財務挹注。10月，《臺灣日日新報》報導屏東設置女學校一事，在地方人士的積極陳情下，「當局亦考慮中。七年度。或得實現」，但高雄中學校增班則恐難以落實。隨著進入拓務省的總督府預算審議在11月傳出可能順利通過的好消息， 只是校舍的問題依然難解，即使建築工程緊急開工也絕對來不及開校，因此渡邊街長積極尋覓校地，召開臨時協議會討論臨時校舍， 為了趕上隔年的開校，不足的開辦經費二萬元地方人士也考慮以募資或舉債的方式籌措。

1931年12月5日，野口知事在高雄州協議會表示「關於中等教育，…（中略）此外，有關女子高等普通教育，僅有高雄高女，吾以為女子教育機關有進一步整備之必要，幸好我在總督府聽聞昭和七年度屏東高女的開辦經費已被計入野口知事的此番發言，可說是讓屏東地方民眾吃下定心丸了，這次終於可以笑臉迎接在地的高女。屏東高女終於在4月1日正式獲得設置認可， 並暫用屏東女子公學校校舍做為臨時校舍，6月，屏東高女創校，16日，臺中師範學校教諭大森丈之助被任命為屏東高女首任校長， 7月2日舉辦開校祝賀會， 當時屏東商工會所舉辦的納涼廉賣會還因此配合延期兩天舉行， 地方人士並決議以協議會的名義，對協助屏東高女成立的知事、州協議會員與其他盡力者表達謝意。 屏東人多年來的心願，這次終於得償所望。

歡迎加入高雄文史研究撰寫的行列！對高雄有深切興趣的學生、研究者、文史工作者、學者專家，如果手上有未出版的高雄主題文章、博碩士論文，或正在進行的研究計畫、訪談口述、田野調查等，誠摯邀請您踴躍提出申請！

until
即日起至 **09.30** September

專書出版及文史調查

申請要點

研究部 07-5312560 #209 kaohsiung.study@gmail.com

指導單位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Bureau of Cultural Affai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主辦單位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2026 寫高雄 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 文史獎助計畫